

# 文学史研究

## 现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史料错讹

黎保荣

内容提要：一直以来的文学史著作，过于强调体系性、思想性、理论性、规范性和资料丰富性，但由于各种原因，对于信度问题即资料的准确性、真实性问题却不暇顾及，结果不少文学史著作的资料错讹是比比皆是，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众所周知，资料的信度是文学史著作书写的基础，缺乏这一基础，所谓的宏大理论、深刻思想、恢宏体系都难以立足。故此，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探讨其十大史料错讹类型，便显得甚为必要。

关键词：文学史著作 信度 史料错讹 求真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4.12.001

众所周知，资料的信度，即资料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是文学史著作的基础，缺乏这一基础，所谓的宏大理论、深刻思想、恢宏体系都难以立足。不幸的是，我国的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书写，过于强调体系性、理论性、思想性、规范性和资料丰富，而对于信度问题却不暇顾及，结果不少文学史的资料错讹是比比皆是，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鉴于笔者的专业特征，在此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先生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杨义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温儒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为中心，对其中的史料错讹进行辨正，对文学史书写的信度问题与类型进行考察，并进而思考其启发意义。鉴于目前大学生的积累欠缺，加上这些著作印量不小，影响大，因此便在此献丑，希望贤者不吝赐教。

—

根据笔者多年的积少成多，探源溯流，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史料讹讹或曰史料信度不足问题存在着如下十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史料辨析错讹。

1.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012年印刷）第十三章《沈从文》第212页说沈从文“接触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憧憬，1923年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决心学习写作”。而第223页本章年表1922年条下却如此记载：“夏，只身抵北京”。

既然两种说法不一，就必须对沈从文到达北京的时间进行辨析考问。笔者主张是1923年。依据1980年11月7日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追忆：“我是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到达北京的。”但是时隔将近60年的记忆之可靠性实在堪疑，一般而言，记忆随时间推移而变得模糊，时间相隔越久遗忘程度越高，相隔越短遗忘程度越低。依据沈从文抵达北京几年后的1931年写毕的《从文自传》，可以推断他到北京时是1923年：一者，他初到北京时于旅店登记簿上如此填写个人身份：“沈从文 年二十岁 学生 湖南凤凰县人。”从沈从文对凌宇的自述，加上凌宇的考辨，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出生，<sup>①</sup>可见沈从文应是1922年12月28日方满20周岁，故此他很可能是1923年夏天而非1922年夏天抵京。金介甫也认为沈从文抵京年份为1923年。<sup>②</sup>但凌宇因不敢确定，故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不提哪一年。二者，《从文自传》中提到他被调进保靖报馆，有机会阅读新出的《创造周报》和冰心的《超人》集，根据《创造周报》1923年5月创刊，冰心的《超人》集1923年5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再根据不久他被调回军队，接着他大病40日；又根据病愈不久其好友陆戡于是年初夏溺亡，沈从文为此苦思冥想后决定到北京念书，经历19天终于抵京。<sup>③</sup>综上所述，沈从文抵京时间应是1923年。

2. 余英时著《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版）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文中认为“‘启蒙运动’这一词语直到1936年才用之于五四”（第86页）。

其实这犯了根据不足，缺乏辨析的错误。郑振铎在1921年《戏剧》第1卷第3期发表文章《光明运动的开始》，联系法国文学界的光明运动（即启蒙运动），大声疾呼“开始我们的光明运动”。成仿吾写于1923年，发表于1928年2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启蒙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智识阶级一心努力于启蒙思想的运动”。1930

年3月郑伯奇发表《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指出五四新兴文学初期的直译体西洋化的文体对“启蒙运动的本身，不用说，蒙着很大的不利”，呼吁“中国目下所要求的大众文学是真正的启蒙文学”。<sup>④</sup> 写于1931年10月、发表于1932年4月的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提到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sup>⑤</sup> 鲁迅于1933年9月发表的《由聋而哑》强调中国文艺界“由聋而哑”这种现象“并不能全归罪于压迫者的压迫，五四运动时代的启蒙运动者和以后的反对者，都应该分负责任的。前者急于事功……后者则故意迁怒”。1935年8月郑伯奇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指出“绝望逃避”和“反抗斗争”这两种倾向都是五四“启蒙文学者所没有预想到的”，并且提醒五四运动“中国的启蒙文学运动以后，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和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的对立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有趣的现象”。<sup>⑥</sup> 另外，1935年陈成森发表《新时代的启蒙运动》（载上海《青年生活》1935年第1卷第6期），郑昕在1935年8月的《独立评论》第163号发表《开明运动与文化》。以上诸文，都以“启蒙运动”来指称“五四运动”，只不过也许因为余英时先生史料缺乏，而做了错误判断罢了。<sup>⑦</sup>

3. 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批评者对其理论的概括，在胡风的论著中并没有出现过“主观战斗精神”一词。

其实这大概是因为史料占有不够、辨析不足而导致的无意疏忽，因为仅在胡风的《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中就多次出现“主观战斗精神”这一词语与提法，<sup>⑧</sup> 而在其他场合，他将“主观战斗精神”置换为“战斗精神”、“主观精神”、“主观力”，向现实艰苦的“搏战”等意思相近的说法。直到1984年胡风依旧重申这一说法，如“我的文艺观点如‘主观战斗精神’”“我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我的几个具体论点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等等，<sup>⑨</sup> 这些都表明“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本人提出而且重视的，并非单纯由别人概括而来。

4. 赵毅衡著《伦敦浪了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有一篇《制造剑桥神话的徐志摩》，这篇文章提到：“当时中国钱也真值钱，一个破落地主之家——例如鲁迅周作人之家——有足够钱供兄弟俩在东京闲住多年。”

根据这种说法，鲁迅是自费留学日本的。但是根据有的学者从鲁迅的亲朋好友的说法，鲁迅的自述，学者的相关研究，鲁迅留学当年的中国官费留日者名单与相关实证材料，以及如果是自费留学，鲁迅是否有这个经济能力这五个逻辑步骤严密考证辨析，鲁迅是官费留学日本。<sup>⑩</sup>

第二种类型是史料引用错讹。

5.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十六章《新诗

(二)》第273页有言：“而当殷夫与他出身的阶级‘告别’(《别了，我的哥哥》)，投身于革命洪流，‘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时，他就感到了‘个人’融合在无产阶级‘集体’中的喜悦与幸福。”

按照《拓荒者》1930年5月10日的第4、5期合刊，该诗1929年4月12日创作，主标题为“别了，哥哥”，副标题为“作算是向一个Class的告别词吧！”。另外，该诗刊登后未曾改动，生前其诗歌亦并未结集出版，而在其自编诗集《孩儿塔》中，该诗标题与刊登时的初稿一致。1931年2月7日，他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被国民党秘密处死，似乎并无时间修改该诗。鉴于上述考析，此诗标题为“别了，哥哥”。

6. 金介甫著《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

此书第106页提到《创造月刊》于1922年创刊。但经查《创造月刊》，该刊1926年3月16日创刊于上海，1929年1月10日停刊，共出2卷18期，由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冯乃超主编。

7. 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在该书的第400页提及“实藤秀惠《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张铭三译本(1944年，上海)”一书，其中包含若干错讹。查实，该书作者是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书名应是《日本文化给中国的影响》，中译本译者为张铭三，该书由上海申报馆发行，1944年5月初版。

第三种类型是史料表述错讹。

8.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七章《散文(一)》第115页写道：鲁迅1919年“此期间写下的《自言自语》、《古城》等篇什，意境深远而美丽，是现代散文诗最早出现的精品”。

此处表述不清，因为《自言自语》与《古城》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根据《鲁迅全集》，《自言自语》是鲁迅1919年8月19日至9月9日连载于《国民日报》“新文艺”栏的系列散文的总称，包括《序》《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我的兄弟》七篇，其后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9. 陈思和著《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启蒙传统》。

笔者曾拜读过此文，基于印象对题目有点疑问。根据该文章后面的附录“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我从中国期刊网和原刊物查找了原文，发现原文题目是《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没有“启蒙”二字，

很可能是编入此书作者进行了修改。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后面标注出处时应该指明“略有修改”之类的言论，否则容易令读者产生错觉或误解。

10. 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八章第五节《曹禺研究》中提到“宋剑华就从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角度切入，写了一系列论文，试图建立一个用基督教文化来解释曹禺戏剧的框架”，并从曹禺早期接受的基督教文化启蒙教育、曹禺话剧创作模式、曹禺剧作的人物类型三方面，结合曹禺的四大名剧来进行分析。

我给学生讲曹禺戏剧，参考了这一节的内容。我发现该节分析完上述内容后，著者标注的注释“38”令人费解。该注释是“宋剑华：《试论 雷雨 中的基督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我纳闷，一篇单论《雷雨》的论文怎么可能对整个曹禺戏剧进行分析呢？为此我查阅了宋剑华的该文原文和相关曹禺研究著作，发现该文题目原为《试论 雷雨 的基督教色彩》，没有上题的“中”字；文章内容只研究《雷雨》，并未论述曹禺的其他剧作。所以如果为了呈现相关研究的最初成果，该注释可以表述为“见宋剑华《试论 雷雨 的基督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等系列论文”。更严格的表述是结合包含上述分析内容的宋剑华的已出版专著如《困惑与求索：论曹禺早期的话剧创作》（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来做注释。

11. 张光芒著《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如果说该书第74页把《俱分进化论》的作者“章太炎”误写为“严复”属于史料引用错讹，那么该书多处出现“有人说”而不做任何注释的情况，理应属于史料表述错讹。例如《导论》部分的前几页是这样来对中国现代启蒙概念和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思潮类型进行综述的：“比如，有的把启蒙等同于现代性，有的则把启蒙作为现代性之一种。也有学者提出……文化的现代性与启蒙的现代性”；“如有不少学者把中国新文学的启蒙思潮分为‘政治启蒙’与‘感性启蒙’两种，……还有不少学者惯于从‘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二者相冲突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动态规律或重构文学史。”但是该书在如此评述的时候，从不注释该观点出自何人何时的何书何文，不说其他，且拿“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分论对举这种观点，较早出自本文前述的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一文，而该书似乎见而不显，在史料表述上的确存在不足。

第四种类型是史料理解错讹。

12.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17页有言：周作人在1918年发表的《人的文学》，“要求新文学必

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

实际上，周作人《人的文学》中“非人的生活”提到的“非人”并未特指“底层人们”，因“人的文学”第二项“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既然“非人的生活”与“平常生活”并举，故此从逻辑上推断它指的是“非平常生活”，未必特指“底层人们”的生活。正因如此，周作人才指出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是写妓女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以及提倡女人殉葬殉节的文学却是非人的文学。妓女和殉葬女人的生活都是“非人的生活”，但不一定是底层人们的生活，殉葬的女人就未必是底层人们，可能更多是有钱家族。故此关键点并非生活的“非人”与否，而是注重创作态度的“严肃”与否。“简单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sup>⑪</sup>同理，他的《平民文学》里的“平民”说的也不是底层人们，却是“世间普通男女”，“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周作人虽然自称“我们”“普通男女”，但他肯定不是底层人们，故此《平民文学》的“平民”指的是人类或作为类的人；所以，周作人才公开声明“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sup>⑫</sup>

第五种类型是史料校订错讹。

这种错讹类型比较常见，尤其是在相关的文学史教材中，由于篇幅浩繁、体例庞大、作者众多，很容易导致史料校订错讹，即同一史料在不同的章节面目悬殊、差异甚大，从而使得该文学史教材或著作的史料存在漏洞。

13.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十八章《散文（二）》第309页指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就因其对现代艺术散文体裁的独特的制作，1936年被授予《大公报》文艺奖金”；但第317页本章年表1937年条下却记载“5月何其芳《画梦录》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究竟何其芳哪一年获得该报文艺奖金呢？查阅《大公报》1937年5月15日第二版公告即可获知真相：

#### 本报文艺奖金揭晓

本报二十五年度文艺奖金一千元，兹由文艺奖金委员会审查委员杨今甫，朱佩弦，朱孟实，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沈从文诸先生投票推荐作家，其得全体委员过半数推荐之当选人及其作品披露如下：

曹禺（戏剧：《日出》）

芦焚（小说：《谷》）

何其芳（散文：《画梦录》）

除专函通知当选之三先生外，敬希读者诸君注意。

在当日《大公报》的同一版还刊登了评论《本报文艺奖金发表》。而在第三版《本报文艺奖金的获得者》一文中对何其芳《画梦录》称道有加：“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一向散文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的出版雄辩地说明了散文本身怎样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故此，何其芳《画梦录》获《大公报》文艺奖金的时间应为1937年。

14.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九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二）》的正文第157页写到“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1934年9月主持出版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次年9月又有《宇宙风》问世，依托三个刊物为阵地，形成了一个标榜‘性灵文学’的文学流派”。但根据第169页该章年表记载，《论语》创办时间相同；1934年4月林语堂主持《人间世》创刊；1935年7月，林语堂、陶亢德主编《宇宙风》半月刊创刊。在后面第十八章《散文（二）》的第304页正文却声称：“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两刊。”只不过该章年表第316页内容却与正文不同：《论语》创办时间相同；“1934年4月林语堂等主办《人间世》半月刊在上海创刊。1939年12月终刊，共出42期。”“1935年9月，林语堂主编《宇宙风》半月刊在上海创刊，1947年8月出至152期终刊。”

查阅《人间世》与《宇宙风》原刊，得知《人间世》半月刊1934年4月5日在上海创刊，1935年12月终刊，共出42期。而《宇宙风》半月刊1935年9月16日在上海创刊，1947年8月出至152期终刊。

15.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十六章《新诗（二）》提到殷夫的同一首诗，第272页标题是《1929年的5月1日》，而第273页与274页均为《1929年5月1日》，究竟孰对孰错？

翻阅原刊，此诗原载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五月各节纪念号》，题目原为《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1929年5月5日作。<sup>⑬</sup>

第六种类型是史料版本运用错讹。

16. 陈军著《中国话剧的衰落与消亡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吗？》（《中国戏剧》2006年第1期）提到曹禺的戏剧“《北京人》中则写到瑞贞和愫方受到‘革命朋友’的影响而出走的事实……可以看出曹禺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越来越明显”。

查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12月出版的单行本《北京人》初版本，影响瑞贞和愫方出走的袁任敢和袁圆父女，一个是人类学者，另一个则是个16岁的天真女孩，并没有什么“革命朋友”的身份和特征，那么陈军的这一论断是怎么得来的呢？我想他很有可能读的是1951年8月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选集》，该书由茅盾主编，属于“新文学选集”中的一种，收入曹禺民国时期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三大名剧。曹禺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风气和革命势头，1951年的“开明版”对《北京人》原著进行了大量修改，这是一次失败的修改，故此曹禺于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禺剧本选》中，让《北京人》回到1941年原著的本来面目。那么，1951年“开明版”的《北京人》是如何把袁任敢等人物塑造为“革命朋友”的呢？例如把袁任敢从正直深沉、热心助人的学者，改变为热情歌颂劳动与劳动人民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党在抗日时期的地下工作者；把不堪压制、离家出走的瑞贞改为投身革命，勇敢坚决的女战士；让农村孩子小柱儿变身大喊造反、懂得革命道理的革命苗子。这是不符合1941年《北京人》创作的作者实际和历史事实的，因为按照曹禺的自述：当时他“根本不懂得革命”。<sup>⑭</sup>用十年后的思想来代替十年前的思想，用共和国成立后的修改本的思想来说明民国初版本的思想，无论从人生阶段，还是从历史阶段来说，还是从史料运用来说，都是不可取不可信的。鉴于陈军是把《北京人》和其他三大名剧并举，如果他读的是1951年开明书店版的《曹禺选集》选入的《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然后在其他书籍读了《原野》，把修改本错认为是初版本，这只是缺乏辨析；但是如果为了和其他三大名剧微不足道的阶级政治影子并举，而故意用含有“革命朋友”情节的《北京人》修改版和其他三大名剧的民国初版本并列，来证明其“曹禺对现实政治的关注越来越明显”的观点，则不仅张冠李戴、不合逻辑，也体现不了求真的研究态度。

第七种类型是先入为主，过度阐释。

17. 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2001年印刷。

该书第163页把丘东平的《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误写为《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这是史料引用上的瑕疵。因为根据1947年上海希望社出版的丘东平的《第七连》，198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丘东平的《沉郁的梅冷城》，以及高远东编选的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丘东平代表作·第七连》，多重印证丘东平该作品题目应是《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

如果说以上弄错题目只是史料引用错讹，那么如下（该书第157页）的史料



运用则是先入为主，过度阐释：

（丘东平时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1941年6月，日军“扫荡”苏北盐阜地区，东平率鲁艺二队的二百余人突围受挫，以庄严的道德感拔枪自杀，实现他的人生目标：“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毁。”

关于丘东平之死的史料，杨义没有说明其“以庄严的道德感拔枪自杀”源出何人何典，只是转引郭沫若《东平的眉目》一文中丘东平的那句话来印证其自杀的结局。我们读过郭沫若该文之后发现：第一，丘东平的那句话根本不是对死亡的预想，而是表达了难以达到创作“伟大的目标”的“苦闷”，以及“不全则无”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创作反思。第二，郭沫若该文写于1935年11月17日，距离丘东平之死还有将近6年时间，并非对丘东平自杀的推断，更不是对其自杀的印证。故此，我们不能以创作的苦闷来猜测其自杀的结局，不能以先前的别人的文章来推断其后来的死因。

那么，丘东平之死真相如何？

经查中国期刊网和相关图书，从1980年至1987年有几篇文章涉及丘东平之死，但是没有一篇说他是自杀的。目前只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丘东平在危难之中要求警卫员向他开枪，但是该文作者也认为这是近四十年后根据别人的追忆来写，“可能有误记之处”，<sup>⑮</sup>更何况当时跟随丘东平撤退的是“鲁艺”的人员，而不是老百姓即该文所言的“当地人”，难免有误。蒋天佐在1980年的《丘东平的卒年和牺牲情况》中反对这种说法，“我觉得这种说法表面看来似觉壮烈，其实是既不合情理，也是很不好的。试问，那个警卫员到哪去了？他是自杀的还是被敌人杀害的？……再则，当时鲁艺干部并没有警卫员，这是因为盒子枪很缺。”再进而指出丘东平牺牲的实情：丘东平其时已经在桥外，脱离危险区，但是他看到桥内很多同志受困，于是爬上桥头草垛指挥撤退，在大批同志因而脱险的情况下，他被日军发现后遭射击，“头部中弹，当场牺牲”，这是“历险的许多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当时所转述，我看是比较可靠的”。<sup>⑯</sup>198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丘东平的《沉郁的梅冷城》中附录了陈子谷的《我所知道的东平同志》、丘健生的《少年时代的东平叔叔》、陈辛人的《丘东平小传》和于逢的《编后记》都采用了丘东平被敌人击中而牺牲的说法；杨淑贤发表于1985年的《丘东平生平年表》和1987年的《丘东平传略》也如此认为，只不过更为具体准确，例如1985年《丘东平生平年表》指出丘东平牺牲的时间是1941年7月24日凌晨，10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作家丘东平殉国消息》，10月31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作家

丘东平在苏北殉国 同时被难者五十余人》，其后的11月和12月，奚如、胡风、西民、欧阳凡海、圣门、欧阳山等分别撰写了相关文章。<sup>①7</sup>

故此，丘东平是被日军击中牺牲的，而非自杀殉国。杨义的说法可以说是先入为主，是为了证明丘东平“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毁”的过度阐释。其实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1986年9月出版，第二卷1988年10月出版，第三卷1991年5月出版，无论是哪一卷出版的时间都要晚于上述文章的发表时间（尤其第三卷更是在蒋天佐文章发表的11年之后），如果杨义略为细心一点，就能够获悉丘东平死因真相。即使第三卷出版当时没有发现，时隔十年至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印刷出版的时候也应该对此进行修改和还原。

这种史料先入为主过度阐释，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曾经在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到“文革”结束这一段时间内较为流行。有学者指出1950年代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使得新文学史更加政治化，以政治风向来判断作家思想，“如刘著《初稿》述及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时，认为是‘蒋介石特务匪徒胡风’，挑拨鲁迅与周扬、夏衍、冯雪峰之间的关系，而‘鲁迅当时对于胡风的阴险恶毒的反动面貌，已经开始有所觉察’。”这不知根据什么说的，不能不说是犯了史学之大忌。这样一种“‘以论带史’的方法，而且发展到‘以论代史’，成了建国后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研究方法，至今不衰”<sup>①8</sup>。

第八种类型是史料编辑错误。

18. 饶芃子、黄仲文编著《戴平万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该书实为戴平万研究资料，除了编入戴平万生平与创作概述、年谱、著译目录、上海“孤岛”时期所编文艺刊物目录、别人对他的回忆录和创作评价等之外，还选录了他的“未结集文章”15篇，以及编入了他的部分“文学作品”（18篇小说和散文），全书292页，戴平万的文章和作品就占了191页，史料扎实。饶芃子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所言的“现在面对戴平万的这些作品，同样有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只有正确承认、对待这种历史性，把它们作为理解对象，我们才能在自己的视界里去同它们融合，理解它们的直接意义和字面之外的多层意义”，以及她提到的对文献史料的搜集、发掘、整理和鉴别工夫，显示了其严谨的作风。

然而当笔者在看过戴平万发表在《拓荒者》的一些作品以及其小说集《陆阿六》之后，再读这本《戴平万研究》中的相关作品时，却发现该书收录的《陆

阿六》与原稿差距甚大，这无论是编著者的疏忽也好，还是出版社编辑的错误也罢，都必须修正。因为既然是“研究”，理应实事求是地全文照录，即使要删改，也要加以说明。

该书删改处如下：在该书的第216页，被编入的小说《陆阿六》的将近结尾部分如此写道：“他把从前的牧牛的同伴组织起来了。在秋收的时候，他和农会的熟练的工作人员举行了一次抗租的××运动。”但原著这两句话之间的一千多字却被删去了。是否编著者看的是另外的版本？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第一，戴平万没有删改过《陆阿六》；第二，在《戴平万研究》出版之前，没有收入另一版本的《陆阿六》的作品集问世；第三，从《戴平万研究》的《戴平万文学著译目录》的第83页可知，该书所选取的《陆阿六》应该是发表在1930年1月的《拓荒者》第一卷第一期的同名小说，以及1930年5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同名小说集，但据笔者从这两个材料源的阅读所得，在前述两句话之间的大量的文字的确是被删掉了（按照1930年版的单行本《陆阿六》的规格，《戴平万研究》删去了此书的84行文字）。

那么，就只能从被删除的情节入手来思考其删改原因。被删除的内容情节是：陆阿六的同伴阿牛，开始不听阿六的话，不愿意加入农会。他有“每天晚上总是喝醉酒，满村里乱窜，粗着声音哼着小曲儿”的不良习惯。他有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年方八岁的童养媳大妹，有一晚，阿牛喝醉酒强奸大妹未遂，消息传遍全村后，阿六找他理论，双方发生争执而翻脸。另一晚，阿牛无钱喝酒便往夜学里去，听到甘先生给农友讲吐谷蕃阿才折箭的故事，领悟到“齐心合力”的道理，遂与阿六和好，加入农会。

也许编著者或出版社编辑觉得这种情节有损革命队伍（农会）的严肃性，或者有损结构的紧凑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这种情节对小说结构丝毫没有影响，因为被删除内容的前面有一句“他把从前的牧牛的同伴组织起来了”，后面有一句“在秋收的时候，他和农会的熟练的工作人员举行了一次抗租的××运动”。被删部分就是承上启下的，结构紧凑，并无枝蔓。另外，被删内容丝毫不损革命队伍的严肃性，反而体现出革命队伍的吸引力，革命道理的征服力，革命同志的友谊，以及革命知识分子（甘先生）的启蒙有效性（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革命能够让一个每晚喝醉、强奸童养媳的粗野小子心悦诚服，反而见出革命的巨大磁场和正能量。

简言之，无论这种删改是出于出版社编辑还是编著者之手，都应在小说后面加以注明。饶芃子老师在该书“后记”中声明：“书稿最后的增删改动由我负责，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似乎期待同行或读者的反

应，因我曾阅读过《陆阿六》原著，为了提醒读者和还原真相，故指正于此。

19. 于润琦编选《陈铨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该书第336页戏剧《野玫瑰》以夏艳华的“立民，你知道三年前我为什么嫁给你吗？”这一句话戛然而止，令人甚觉突兀。但是该书紧接着注明出处“《野玫瑰》，1946年初版，商务印书馆”，令人打消缺页的疑虑。该书这样的结尾和出处都是有问题的。首先是出处有问题，因为陈铨的话剧《野玫瑰》刊载于1941年的《文史杂志》第1卷第6期至第8期，1942年4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并非1946年初版，而且陈铨也没有对该剧进行修改。（抗战胜利后，该剧被改编为电影，剧名改成《天字第一号》。）其次是情节有出入。该书把陈铨的《野玫瑰》原文结尾部分“立民，你知道三年前我为什么嫁给你吗？”以下近40行文字整个删除。被删除的内容是妻子夏艳华在汉奸丈夫王立民临死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使得王立民认为她是他生平遇见的最厉害的敌手，但是夏艳华指出“你最厉害的敌手，就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民族意识”，导致王立民在充满失败感而又见不到女儿曼丽的情况下死去。最后，夏艳华与仆人王安用暗语互通间谍身份后，安排逃走事宜，并在“寂寞的野玫瑰！欣赏你的人已经走了！这儿你又不能呆了！你再要漂泊到那儿去呢？”的自言自语中结束全剧。如果出于编辑的无意疏忽或者印刷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对于作品只能保留其原貌，不能根据主观好恶来进行编辑、删改。何况这样的结尾也有其作用：一方面亮明主题，汉奸、敌人“最厉害的敌手，就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点题，这位女间谍就像野玫瑰，有才有貌，但是到处漂泊，而能够支撑其精神世界的依然是民族意识。

第九种类型是作品复述错讹。

20.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十三章《沈从文》第217页，著者提到沈从文的《八骏图》意蕴：“作家达士先生在青岛的大学生活期间，发现周围的七教授个个都患了性压抑、性变态的病症，便在给未婚妻写的信中——刻画了他们的虚伪处。”

只不过这番叙述却与原文具有差距。原文如下：

（达士先生）发现了七个同事中有六个心灵皆不健全，便自然引起了注意另外那一个健康人的兴味。……他知道那是经济学者教授庚。

达士先生早已发现了，原来这个人精神方面极健康，七个人中只有他当真不害什么病。这件事得从另外一个人来证明，就是有一个美丽女子常常来到寄宿舍，拜访教授庚。

……教授庚与女人的沉默，证明两人正爱着，而且贴骨贴肉如火如荼的爱着。<sup>①9</sup>

从原文得知教授庚“精神方面极健康”，又因其拥有热烈的爱情，不会导致性变态。既然如此，又是什么导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其视为“病人”呢？很有可能是并未参透原文，以及按照标题来断章取义，实际上标题的“八骏图”并非说八个教授全为“病马”，只不过引用青岛那位大学校长的说法，“他似庄似谐把远道来此讲学的称为‘千里马’；一则是人人皆赫赫大名，二则是不怕路远。”所以，“八骏”是说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而不是说其精神。

21. 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该书第278—279页，杨义如此复述端木蕻良《遥远的风沙》的结尾情节：（队员们前往收编土匪）“被派来联络的‘煤黑子’浑身匪气”，作恶多端，“途中遇‘正式军队’，‘煤黑子’用土匪黑话联络失效之后，匆忙逃遁’。”

其实这里情节、意蕴都存在着漏洞，对原文有所误读。原文如下：

“你们滑吧，我‘撒’着（一个人在后边死守）！”

双尾蝎（队长——引注）挥着他青瘦的手。命令我们：“快！”

……

煤黑子跳下来，跑到陈奎跟前，抚抚他的心口。把他手缚在马背上，又回过头去望望贾宜的尸首……他脸上剧烈的一阵子痉挛，好像他对一切都忍耐不住了。“我不能走！”他吼着。

……

煤黑子把陈奎的“子母带”莽撞的围在自己腰上。向马狠死命的一鞭，马便带着一条血痕拖着挂彩的主人“放趴”的飞驰去了。

煤黑子转过脸来愉快的向我笑了一笑，不等我看清他的表情，就在我的马臀上猛刺了一下，我的卷毛芦花便立刻赶向前边的马去了。

……

忽然一个尸身（指队长——引注）直立而起，向我摆摆两手，这真是惨痛的景象……

我想另一匹马尸首（指煤黑子——引注）也会霍然的耸立起来，但是他站不起来了……<sup>②0</sup>

比较得知在小说结尾，煤黑子在遭遇“奴才的狗子”（敌军）、朋友阵亡的情况下，并非如杨义所言的“煤黑子用土匪黑话联络失效之后，匆忙逃遁”，临阵脱逃，与小说开始的恶劣形象保持一致。相反，“他脸上剧烈的一阵子痉挛，好像他对一切都忍耐不住了”，表现出其情深意重的特征。面对队长撤退的

命令，他不愿贪生怕死，还在“我”的马臀上猛刺，好让“我”迅速撤离，他却心甘情愿拼命殿后誓死复仇，最终马革裹尸还，表现出其英勇无畏的品格，故此作品最后为之悲痛惋惜。他由“私恶蛮勇”向“大善大勇”的转变，由“土匪”向“英雄”的转变，与被收编作革命军参加民族解放事业的目的紧密相连，如果缺失这一目的，他最后的临危不惧也不过是绿林豪气，绝不可能是民族英雄品格。周立波《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中极力称赞煤黑子是“一个在中国文学里不常出现的土匪的典型的性格。……到末尾，有着土匪性格、无恶不作的煤黑子焕发着殉难者的圣洁的光辉，是怎样令人怀念呵”<sup>②1</sup>。正因此，煤黑子走向最后“收编”的路正是一条使土匪向革命战士升华的路，是一条走向英雄的“心路”。正因如此，“他的那些路途中的恶德恶行既是客观的写实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铺垫’和对比，它们的存在为煤黑子最后的行为作了生动的衬托，益发增添、强化着其神圣和英雄色彩。或者说，煤黑子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个‘罪徒’走向最后的神圣，他的那些‘路途’中的‘罪孽’使其最后的‘圣化’和‘成仁’具有更加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效果。”<sup>②2</sup>

22. 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

此书第二章第36页，夏志清提到《祝福》，指出“鲁迅刚回到故乡，……他和祥林嫂有一次怪异的谈话，谈的是灵魂之有无，这一席谈话反而使祥林嫂更坚定她自杀的意念”。短短一句话却存在着两点错误：一则，小说中的“我”与作者鲁迅未必一致，换言之第一人称叙述者未必甚至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此乃叙事学的简单原理。二则，夏志清何以断定祥林嫂“自杀”？小说中并无明示或暗示。既然如此，祥林嫂死因为何？在小说中有暗示：天气是大雪的严寒天气，“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其境况则可从她“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判断她已行乞很长时间了，从“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可以判断她并未获得别人的怜悯和帮助；上述情况让她饥寒交迫，难以维持基本生存，而她头发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的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所彰显出的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境况，以及“我”对其灵魂有无的疑问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更让她难以维持精神的生存，只是“增添末路人的苦恼”。既然肉体和精神都难以生存，祥林嫂唯有死路一条，故此短工对她的死因“淡然”冷漠回答“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实则体现出祥林嫂肉体和精神生存的双重“穷”途末路，她的确是“穷死的”，并非“自杀”。<sup>②3</sup>

第十种类型是史料抄袭剽窃。

所谓抄袭，可以分为有意抄袭和无意抄袭。所谓有意抄袭，就是千方百计抄袭别人的观点、材料而不做注释或注释不充分，故意把别人的观点、材料占为己有。而所谓无意抄袭，就是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因为粗心大意，引用了别人的东西忘记注释，造成抄袭，只不过很难判断无意抄袭的“无意”程度到底如何，只能根据作者为人和抄袭的多寡来初步判断。

23. 张光芒著《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俞兆平撰文指出：

《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五章第二部分“成仿吾与康德哲学中的‘客观’”一节（P244 - 251），百分之六十抄袭自我的《成仿吾的“客观”与创造社的“自我”》一文（《文艺报》1999年7月6日综合评论版）。但他抄袭的手腕，颇为诡异，让你感到有点啼笑皆非。……他又不像魏红珊同志那么大胆无畏、干脆利落地窃走，而是有点心虚，所以在本节快结束部分，忽然插入这么一段话：“有论者所指出，从郭沫若到郑伯奇再到成仿吾，他们对艺术创造的出发点——‘内心’、‘自我’、‘客观’等的表述、追寻及界定，走过了一条从个体体验到理性概括，从概念的不确定性到概念的明晰定性的路程。……”然后在该页的页下注明我就是这一论者：“参见俞兆平：《成仿吾的‘客观’与创造社的‘自我’》，《文艺报》1999年7月6日。该文对创造社‘客观’理论的哲学内涵作了精辟的论述，不过该文作者认为这种审美认识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原则，对此笔者持有异议。因为成仿吾这时尚未完全建立起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其关于美学思想的探讨从哲学本体论上说更接近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P251）他玩的这么一手，的确有点高明。一方面，说明他有注出你的文章，像是在遵守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又说明你的文章是有错误的，我以上所研究的是对你的更正，不是抄你的。这正像一名小偷，偷了你的东西之后，还要说你的东西是次品，不值得偷。……这样，不但我的有关的研究成果被他堂而皇之地窃取去了，而且还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张光芒纠正了俞兆平在研究中的错误。<sup>②4</sup>

这是一种“先抄袭，再评价”的抄袭方式，它注出被引文献，但是对其抄袭的内容缺乏注释，而是一笔带过地对被引文献进行或否定或肯定的评价。

## 二

毋庸置疑，上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著是同类论著中的佼佼者，虽然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存在一些史料错讹与瑕疵，但毕竟瑕不掩瑜。这些错讹是本人批阅数载，积累所得。本文之所以指出其错漏，是希望这些优秀的论著日臻完善，不至于继续给读者以负面的影响。

上述论著的史料信度不足，给我们诸多启发。

首先是应有认真的精神和严肃的态度。

众所周知，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之中，史料的地位都甚为重要，而史料的信度问题决定了对史料的发掘和理解是否真实准确。若缺失这一前提，那么无论研究者的理论多高明思想多深刻观点多新颖，其结论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也就是说，首先要具备史料的“信度”，在此基础上史理解的“深度”和“新度”才具备了基本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要思考史料的信度的三个相关问题：你读了没有？你读准确、细致了没有？你读懂了没有？如果缺乏其一甚至全未做到，都将导致史料信度不足。

文学研究需要认真的精神、实验的耐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这与自然科学并无二致，它的本质是“求真”，必须以真诚的态度、认真的精神、严谨的思维去对待。即使作为个人疏忽个人缺点，理当谅解；但作为学术错误，却必须修正。

其次是合理处理史料的“多”与“真”的关系。

很多研究者都期望对史料能够涸泽而渔，占有得越多越好。“没有搜阅和发掘史料的艰苦功夫，不将理论思辨的抽绎置于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自己的研究结果，也就可能成为一种主要在臆想中运行的崇弘议论，往往会徒然挥霍自己的才华而失去历史研究者的宝贵品格。”<sup>②5</sup>这种研究观念的影响，研究者对史料是一味贪多，但是他们热衷于发掘史料的时候，往往容易忘记对史料进行必要的、科学的甄别、比较或还原。若言前者是越“多”越好，那么后者则是越“真”越好，“多”与“真”紧密结合才是硬道理。上述有的论著竟然出现如此之多的史料漏洞，很明显是忽视了甚为重要的史料的“真”问题。史料的真实意味着结论的真实，也意味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性、深刻性之可能，若史料缺乏信度，无论研究者罗列的史料怎样汗牛充栋，其结论也是浮夸空虚，不具备充足说服力的。

再次是正确处理“史”与“论”的关系。

从上可知，十大史料错讹类型，或者“乏史出论”，根据不足，导致辨析错讹，结论自然也不客观；或者“错史出论”，史料理解、引用、表述、校订、编辑都出错，这样的史料，或多或少会影响理论、观点的正确性；或者“改史出论”，先入为主，过度阐释，为了论述方便，删改史料，削足适履，偷梁换柱；或者“窃史出论”，剽窃抄袭他人观点、材料，据为己有。正因如此，有的学者反思道：“不去认真地占有资料，从事实出发去研究历史，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而只是凭着现有的、已被普遍使用的材料，从外部用某种一时被认为先锋的理论包装一下，以为这就提高了史著的质量，完全是一种误解。由于这种包装不是量体裁衣，所以尽管也颇为鲜艳夺目，却并不好看，甚至还要削足适履式



地去修改、歪曲史实。其结果，反而是损害了历史，也降低了史学的威望。”反对“不顾历史事实，理论为先”，尤其是“政治理论为先”的文学史著作写作方式。<sup>②6</sup>鉴于此，黄修己先生对“史”与“论”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见解：“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这两条治学路线都重要，因为同一个学者，有时可能从“史在”入手，他在收集、整理史料的过程中，思想上有所发现，并归纳、抽象出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理论；而另一时候，他可能从“我思”开始，先有了某一理论或观点，或是受到它的启发，把它放到大量的史实中去考察、检验，在得到了大量史实的验证，经过调整、充实修订后，最后确立为自己的观点或理论；关键在于，我们带着“我思”进入史实之后，有没有自己的新发现，能不能根据客观的事实来修正、补充、提高乃至抛弃这种“我思”，并形成更准确地反映“史在”的新“我思”；他更期望“历史研究以及文学史研究，从史而出论，因而发生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尤其是像斯宾格勒、亨廷顿、泰纳、勃兰兑斯等人一样善于“理论的抽象”，抽象出一种影响深远的重要的文学、文化理论。<sup>②7</sup>

其四是恰当处理“史”与“注”的关系。

前述有几种史料错讹类型，很明显是由于缺乏注释或者注释不规范所致。

考虑到学术规范的作用和意义，务必注意注释的原则。第一，要有原典意识即第一手材料意识，尽量少用或不用间接的材料，以免出错。如果阅读作品最好读最初发表时的刊物的原著或初版本，次之读全集，再次之读文集，再次之读选集或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但要密切关注学界对该书籍的史料纠错，如《老舍全集》初版就错漏百出，就连校订多年的《鲁迅全集》都难免错讹。而对于外国的资料最好读原文，或者读精通原文的专家的翻译，避免转译过程中意义的过多遗失。第二，要有认真意识，不仅要读原典，而且要细读原典，读懂原典，务求准确理解。第三，要有规范意识。引用一次，就注释一次；引用多少，就注释多少。注释需要准确、规范、统一。所谓准确就是引用文献的观点、材料要原原本本，不增不减不歪曲；所谓规范，就是按照注释的格式规范来做，出处要具体明确，对于非专业网站的资料一般少用或者不用，如果要用，该资料必须是在纸质材料和专业网站都没有，而且并未发表，而且真实可靠、较有新意的；所谓统一，就是引用同一文献，版本要统一，例如引用鲁迅的《狂人日记》，不能在文章中不同的地方用了《鲁迅全集》，又用《鲁迅选集》，又用《呐喊》的单行本，只能统一用一种文献。另外，要有诚实意识：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都必须注释，但是不能用引用、注释代替研究者的论文写作和思考，连续引用几篇文章，拼凑起来，没有自己的观点，或者故意注明不重要的相关文献，有意略去实质性引用文献，这两种做法都会造成抄袭。而别人如研究者的同学、老师、朋友

等等曾经口头或者书面提过的但是并未发表刊登出来的属于对方的观点，也应该注明是何人何时何地（如在讲座、学术会议、讲课、班级讨论会或者教研室讨论会等等场合）提到的观点，例如钱理群曾在他的《心灵的探寻》中引用学生试卷、作业中的观点就是明证。有学者指出已故北大著名学者季镇淮先生教导其关门弟子这样做学问：“我们那时写了文章，总要在手里放几个月，先给朋友们看看，如果谁的观点对我有启发，我就要在文章中加个注释，说明这一观点最初来自人家。著书立说的第一件事是诚实，做学问不能掠人之美，这是规矩。”<sup>②8</sup>

其五是让文学研究回到文本自身。

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了若干研究模式，或重视史料，或重视思想，或重视理论，文本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上述的文本或作品复述错讹，有个别已不是有没有读懂文本的问题，而有可能是为了理论而有意篡改文本的问题。

这就亟须回到文本，亟须对文本与理论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其关系一曰“从理论到理论”，按照有的前辈的说法是从“我思”到“我思”，“有的人从西方搬来某个‘先锋’理论，从这理论开始，却又不进入史实，只是挑选几条于己有用、有利的材料，作为那‘先锋’理论的例证。……他的第一个‘我思’并不是我的，是别处搬来的；到了第二个‘我思’还不是我的，还是人家的。”<sup>②9</sup>二曰“从理论到文本”，即把理论作为一种视野，与活生生的文本紧密结合，有新意够严谨又有历史感。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堪称这一类型的范例，该书借鉴了西方叙事学理论，但是却不生搬硬套，“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种假设，能否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并借以更准确地透视历史才是关键。不曾与研究对象结合的任何‘新方法’都只是一句空话；而研究一旦深入，又很可能没有一种‘新方法’足以涵盖整个文学现象。衷心感谢‘新方法’的创造者和倡导者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但拒绝为任何一种即使是最新最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即使是最精彩的例证。我关心的始终是活生生的文学历史。”<sup>③0</sup>三曰“从文本到理论”，即从大量的文本阅读中抽象出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理论，如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中提炼出“对话”、“复调”等理论，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的作品中提炼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存在主义理论。四曰“从文本到文本”，例如宋剑华的《生命阅读与神话解构》便是显证，我们在里面看不到任何西方理论的框架，他认为“作品文本乃是作家生命意识的思想结晶，是作家精神世界的情感体验与深度思考；而评论家们却自以为是地用某种理论模式，轻而易举地就发现并解决了作家本人所倍感困惑的人生问题！如果问题真是如此简单，那么还要作家或文本干什么？”他提倡“一切批评过程都必须去遵循言说‘文本’与‘文本’言说，每一立论必须具有事实依据，每一结论必须具有情节支撑，批评只

是对文本思想的概括与归纳，而不是超越文本故事的自我发挥”。<sup>③①</sup>

其六是倡导反权威的精神。

学者要勇于怀疑，勇于秉笔直书，勇于说真话，真理面前只有探索，没有禁区。不要由于对方是权威，就一味仰视，我们要尊重，也要有怀疑。因为权威的论著质量高，若研究者发现其中存在的错讹和瑕疵而不指出不说明，这反而影响了权威论著的质量改良和提高。王世家老师2011年10月24日给笔者的信中指出“所谓‘得罪人’，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否则学术上怎么能深入？”此外，不要害怕打击报复，一般而言，权威学者大多是有度量、有境界之人，如果权威学者讳疾忌医，心胸狭隘，指错者疑神疑鬼，畏首畏尾，对学术的发展都将大为不利。所谓反权威，并不必然是反对，而是平视，面对，反思，学习，甚至超越，而这要求后学者具备深厚的学术根基、深刻的学术思想以及鲜明的学术个性。

其七是要具备读者意识，对读者负责。

研究者不只是面对研究者本身，也不只是面对学界，更要面对广大的读者，在读者中培养学术意识，拓展学术土壤。温儒敏先生于2012年11月28日致笔者的信，就充满了读者意识（同时也彰显出前辈学者的严谨、真诚和宽容），征引于此，深表谢意：

“黎保荣先生，贵文指出拙著许多错误，非常感谢！谢谢你的细致和认真，我们的工作确实有些马虎。当初修订此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我们在香山突击一个月，分工去写，然后合成。我们对自己的写作，特别是史料出处之类问题也没有把握，就临时请了几位在史料方面比较有积累的老师专门‘挑剔’，时间也还是很紧，最后就出版了。十多年来，我们自己发现一些问题，许多读者也指出一些问题，我这里收到的相关信件就好些，本想来一次大的修订，可是议论数年，未能做成。我们几位都有些岁数了，现在要聚会修订，也有困难。大概这本书也就不去大动了。但大家提出的史料细节方面的问题，不牵涉版面大动的，还是要想办法改一改。这样也才对得起读者信任。”

作者具备读者意识，指错者亦具备读者意识，对读者负责，为学术尽力，善莫大焉！

注释：

- ①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 ② 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06页。
- ③ 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 ④⑤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67～370、384页。
- ⑥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页。

- ⑦ 关于“启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现与运用情况，黎保荣的《何为启蒙：中国现代文学启蒙内涵及其演变新论》（《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有更详细探讨，此不赘言。
- ⑧⑨ 胡风：《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05～406页。
- ⑩ 黎保荣：《鲁迅留学日本史料考问》，《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 ⑪⑫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11页。
- ⑬ 黎保荣《也说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作品与史料复述瑕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的诸多史料错讹包括校订错讹有详细探讨，此不赘述。
- ⑭ 曹禺：《曹禺选集·后记》，出自《论戏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30页。
- ⑮ 陈振国：《丘东平的卒年》，《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 ⑯ 蒋天佐：《丘东平的卒年和牺牲情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 ⑰ 杨淑贤：《丘东平生年表（下）》，《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 ⑱⑳㉑㉒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270、108，304～306，305页。
- ⑲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19页。
- ㉔ 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5页。
- ㉕ 《周立波选集》第6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3页。
- ㉖ 逢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 ㉗ 黎保荣：《现当代文学作品复述的“信度”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此文列举大量作品复述错讹的例子，可以参考。
- ㉘ 俞兆平：《博士论文的抄袭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关于国内数位博士生抄袭本人著作的严正声明》，《学术界》2008年第4期。
- ㉙ 解志熙：《和而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片论·代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㉚ 王建民：《就“80年代学风”请教靳大成先生》，学术批评网，2010年4月26日。
- ㉛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自序第1～2页。
- ㉜ 宋剑华：《生命阅读与神话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释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黎保荣 肇庆学院文学院 邮编 526061]